

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补贴项目
李元阳 著
施利卓 总编校

李元阳，字仁甫，大和人。嘉靖丙戌进士，改庶吉士。文誉甚都。会以永嘉指出翰林，习吏事，知江阴县，有循良绩。召入为御史，遇事敢言。如止攀承天，诤奸东朝，每称为士林称重。进按闽中，厘吏望风解绶。遇文人墨士，虽布衣与抗礼，荐举晋谏林富、马朝衡等。都试监临，所得士皆一时之选。桂文

李元阳集

散文卷

——出其手，至今为制艺家正鹄。
以特正不阿，当事衔之。会以扈从出公知荊州府，筑堤捍江，民徧碑志德。再罢归。家居四十余年，精研理学，著《心性图说》，与罗念庵、王龙溪钱相印可。至摘为诗文，森爽骀荡，有尘外风。南光任忠斋赠诗：“中溪晚年之学，如磨洗岁晏，万象森严，长松在壑，剥落英华，收敛神气，复归乎其根也。”因自认为知言。寿九十，无病而终。所著有《中溪漫稿存稿》《倦雪台诗》等书，行于世。

——《滇志·人物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序

余幼时已闻李中溪之大名，民间传言先生死后成仙，受人景仰，但不知其究竟为何许人也。及长负笈叶榆求学，方知其为大理文化名人，但亦未知其学问。五十年前编修《白族文学史》，对中溪先生之诗文方稍有研读，而对其学术造诣仍仅识其皮毛，未作深入研究。近年因参与《李元阳集》编校事，读其文集，方对先生之生平行事及诗文学识有较全面了解。其诗文之宏富华美，学识之渊博混漾，妙解心性之学，精研儒释之道，俱令人赞佩不已。余喟然叹曰：吾乡自南诏以来，文人士众多，而若中溪先生者，诚乃其中之佼佼者也。因我滇云地处边疆，山水阻塞，先生之学，除李卓吾、唐顺之、杨升庵等少数学者有所赏识之外，数百年间，几不闻于中原，岂不惜哉！

先生讳元阳，字仁甫，号中溪，生于明弘治十年，卒于明万历八年，享年八十四岁，嘉靖五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江阴县令，监察御史，荆州知府等职。敢诤权奸，刚正不阿，与世多齟齬，年方四十，即辞官归故里。英年早退，雄才未展而壮志难酬，亦人生之憾事也。然以道观之，退居苍洱四十余年，徜徉于山水之间，出入于儒苑禅林，精研学问，著书立说，方有令人瞩目之成就，立一家之言，此岂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谓欤？先生入选庶吉士时，虽已以文才而名动京师，然仕途艰险，案牍劳形，学问之道，无暇精研，及至退居林下，方能离形役而遨游于学海，殚精覃思，独辟蹊径，于理学之研究，尤见其独创精神。吾滇先达李印泉先生谓中溪先生之学“以佛入，以儒出。复性为本，济世安民为用”，诚可谓知言者也。然对其性理之学与儒释之关系，尚未及深入解剖。当代学界，论先生之诗文者多，而究其心性之学者少。伍雄武、龚友德、肖万源诸君虽已论及李元阳之哲学思想，并涉及其心性之学，然亦尚未能深入探讨以唤起学界之广泛关注。

纵观“心性”之说，源于先秦儒家“性命”之学与“正心诚意”、“格

物致知”之说。迨至宋、元、明，由程朱理学，发展为陆、王心学，虽代有变异，而其宗旨仍在于修身养性，修齐治平。中溪先生熟精程朱诸家之说，参与佛老之论，力求三教融通，阐释心性之本义，其视角新，故其理论亦多新义。先生并无心性学说之专著，亦无长篇大论之宏文，其理论观点，多散见于札记、序文及诗词中，而《心性图说》一文，长不过数百字，然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可视为其心性学说之纲要。其新意在于以佛理释心性，兼融老、庄任性自然、忘物忘我之说，对儒学“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之经典学说，对格物致知之哲学原理，赋予以新义。其释“性”云：“人具此性，本自圆明；明是良知，圆是知至。”儒家称之为“天命”，或曰“本性”，即释家所谓“佛性”是也。有佛性自可“圆通”，则所谓“良知”、“知至”，亦即“大光明”、“大智慧”之境界也。释“心”则云：“性之神识，动而为心。心者感物而动之谓也。”感物则心动，心动则为尘所染，圆明之性，已蒙尘矣，此之谓“心识”。“心识发而为意。意为为物所感之谓也。”此之谓“意识”，为物欲所感，则渐失其圆明之本性。“意识流而为性，情者为物之所蔽之谓也。”佛学中对情欲之弊，论之详矣，其所谓七情六欲之害，俱因无明而成造孽之祸端。然则，孟子“尽心”、“知性”以至于“知天”之说，及其“存其心，养其性”之论，与佛性之义亦可互参矣。中溪先生有多篇与友人论心性信函，于理论多有所发挥，且俱以儒释互参，义理甚明。《与罗修撰念庵》书中云：“盖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此性在人为甚真，即本觉也，即道体，即未发之中，得一之一也。”又云：“惟其不觉，是以为妄，认躯壳为我，而不知本觉之为真我；妄认六尘为心，而不知本觉之为真心。”本觉、真心之说，自性、真我之论，乃佛理之核心，与庄子“吾丧我”之说亦有共契。以庄禅之学，阐儒学心性之论，就理论而言则更深一层矣。儒学心性学说之最终目的，乃力图通过教育而达尽心知性之境，故曰：“修道之谓教。”而修道之方，或曰“穷理尽性”，或曰“格物致知”，或曰：“正心诚意。”要而言之，即佛学中所谓“觉悟”者是也，悟道有顿渐之分，视人之愚智而定，故先生《与谢中丞高泉》中曰：“率性之谓道，顿悟此性也；修道之谓教，渐修此性也。顿悟诚而明，知至也；渐修明而诚，致知也。知性则知天，天道也；修身以立命，人道也。”以自诚明比顿悟，自明诚比渐悟，则儒家尽心、尽性之说，最终归于一“悟”字，悟则须反求诸己，不假外求，此即儒家所谓“内省”者也。据此，先生对格物之说亦有新解。其《与乐山张教授》书中有云：“格物者非格去外物，乃格去我交物之识也。使此识不我蔽，不我惑，不我动

也。故正心诚意即是格物，意识心正，即是物格。”今人多以观察研究客观事物为格物，此乃以科学诠释格物之引申意，亦未尝不可。然就其本意而言，则应以修身养性为目的，故中溪先生又云：“格、致、诚、正，是一时事，举其名目则有四，其实皆一时一事也。中人以上可以言顿格，中人以下须渐格也。此谓忘之又忘，惟有大觉矣。”然则格物之义，即悟也，格物而至于致知，此即佛学之大觉境界，亦庄生所谓忘我忘物之“坐忘”者也。

先生之学养，不仅赖其博览全书，慎思明辩，其慧解亦常于与海内名士如杨升庵、李卓吾、唐顺之等友辈切磋琢磨中得之。如与唐荆川（顺之）讨论理学中“寂感”之说，先生以为“寂然不动之谓‘中’，感而遂通之谓‘和’。中即和，和即中。未感名中，既感名和。中如镜体本明，和如镜光应像。”此乃对《中庸》中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诠释。以中和为天地之大本，以寂然不动与感而遂通释中和之性，中与和名二而实一，并以镜体镜光喻之，物感之后方有心、意、情、识之生，则明镜已蒙尘矣。蒙尘则“无明，”故佛学求六根清静，儒学讲修身养性，求格物致知，俱求探其本而非求其形迹之劳也。故先生《与唐中丞济轩》书中又云：“夫道之全体具于人之一心……。圣人以其心役耳、目、鼻、舌、身、意，众人以眼、耳、鼻、舌、身、意役其心，是以有圣愚之别耳。”六根六尘之说，佛典论之甚详，以心王制六根之欲，灭“五蕴”之害，则禅定亦庶几可矣。此岂非儒学正心诚意以知性知天之谓欤？

大理乃叶榆旧地，南诏故都，毓苍山洱海之灵秀，涵千年教化之文明。儒、释、道共存并祀，民俗久已成习，中溪先生生于斯长于斯，自幼受儒学之教育，兼受佛老学说之浸润，是以能以儒学为宗而融会佛老之精义，对儒家修身养性之学多有新发明，对宋元性理之学亦多有新解。不囿于一家之言，不盲从前人之说，见从己出，多有胜解，亦良难能也。李印泉先辈称先生为“理学之钜儒”，唯以“滇僻处西南，无有表彰其学说者”为憾，此亦历史之使然。如今文运昌明，学术鼎盛，先生之学，理应得弘扬继承，董理其著作，校注其文章，阐述其学说，介绍其人品，不仅使后人知其道德文章，亦能弘扬我滇云历史文化之瑰宝，彰显我大理文献名邦之精英。然则中溪先生文集之校注出版，非仅为大理学界之盛事，亦振兴滇学之壮举也。

洱源 张文勋 谨撰

公元二千又九年岁次己丑之春节于云南大学

编校说明

[一] 本书力求搜罗李元阳所有存世文稿，其中散文卷共收入散文 232 篇，包括杂记类 89 篇，序跋类 32 篇，赠序类 48 篇，书说类 27 篇，碑志类 33 篇，传状类 2 篇，论辩类 1 篇，（依《古文辞类纂》分类）。录自《云南丛书·中溪家传汇稿》196 篇（未注明出处者即选自此书），《大理丛书·金石篇》17 篇，天启《滇志》3 篇，嘉靖《大理府志》3 篇，《鹤庆县志》3 篇，道光《云南通志稿》2 篇，《大理县志稿》1 篇，《浪穹县志略》1 篇，《宾川州志》1 篇，《滇文丛录》1 篇，《云南鸡足山志补》1 篇，光绪《云南县志》1 篇，《雪山庚子稿》1 篇，《大理文化》1 篇。

[二] 文稿以简化字横排，少量简化字易混淆者仍用繁体字或异体字。分杂记、序跋、赠序、书说、碑志等七类，每类又分若干小类（不标明）。传状类仅 2 篇，合并入碑志类；论辩类仅 1 篇，合并入杂记类。除“书说类”外，每类尽量按写作年代排列。

[三] 部分文稿参照《云南丛书》刊印之前的有关古籍中的录文进行校勘。差别较大者将异文附录于相关文稿后，以资参阅。《心性图说》按文义附于《再与念庵》之后，不再单列。

[四] 每篇文稿除以现代标点符号作标点外，进行简要的注释，只注释地名、人名、年代等专有名词，以及引文、典故出处。

[五] 本书在诗词卷卷末有“附录”，收录有关李元阳的相关资料，并新撰《李元阳年表》，供读者参阅。

导 言

14 世纪末，大理地区经历了一个阶段社会转型期。按文化变迁的观点，这是一种被称之为“涵化”的变迁过程，即不同文化群体深入接触时所发生的变化。洪武十五年（公元 1382 年）三月，明将傅友德奉旨长驱直入云南，攻克大理。长时期的文化差异，明军势如破竹的涌入，势必引起大理社会的剧烈震动。应当说，作为中华文化的子文化，洱海区域对汉文化并非陌生，至迟在南诏开国以来，由于历代地方王朝的接纳和经营，这里对中原文化已经形成了普遍的认同感。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明代以前这种接纳是主动而渐进的、自愿的借取，那么明代以后就成了在外部压力下的强制借取，变得剧烈而急迫。其结果是“在官典籍，在野典章，悉付一炬”，有一批遗老“抱节而死”，如杨俊夫妇和杨保兄弟，有的则成了不合作的隐逸，如杨黼。这种文化冲突引起的阵痛似乎延续不长久，这得力于民众对中原文化认同基础的作用，也得力于明王朝改变了涵化的策略。“屡徙大姓以实滇”和在少数民族地区开科取士是这种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从此，大批本土知识分子经过科举考试堂而皇之地步入了汉族的上层社会，推进了文化认同的步伐。正如前人所评价：“有明一代，吾滇人才之盛，遂超宋、元，而轶汉、唐矣。”就大理地区而言，更是如此，李元阳在回忆其朝廷生活时曾深有感触地说：“一时吾邑之盛，颇为人所羡。”当时，大理人杨士云、李元阳、高對、赵汝濂、张拱文，有的为兵部，有的为吏部，有的为御史，有的为廷评，同在京师朝廷任要职。他们的道德文章皆被时人崇敬，先是年长的杨士云领头，最终是李元阳执牛耳。

李元阳（1497—1580），字仁甫，号中溪。据说母亲董氏生他前梦见龙背着太阳投入怀抱，于是就给孩子取名元阳，这是一种吉祥的期望。李氏是

大理古城一个殷实的望族，有着良好家庭教育的氛围。李元阳从小好读书，善勤思，除儒家经典外，凡天文、兵法之类的杂书过目就能理解。25岁那年，应嘉靖壬午科乡试，他得了云贵两省第二名；29岁，嘉靖丙戌科会试登榜，“选庶吉士，名动京师，为十才子之冠”（《李文肃公墓志》）。然而，终因朝政腐朽，加之他性格特立不阿，难合时宜，仕途曲折坎坷，一波三折。先是因“大议礼”的馀波，被贬为江西分宜县令，不久又赴江苏江阴任知县。后来因抗击倭寇有功，迁户部主事。不久再升御史，“巡按八闽，激扬施措，士林推服，选士得人最盛”（《李文肃公墓志》）；接着，随皇帝谒祖陵，留下任湖北荆州知府。其间，他捐出俸禄，筑堤凿井，治理水患，被称颂为“大禹之后，一人而已”；他还在童生考试中发现了张居正，并着意培养，后来终成大器，位居首辅，世人都以他为识人。总之，青壮年时代的李元阳是以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种与生俱来的耿直，一种中国士阶层所承担的“社会良心”，进入上层社会去行使吏治的。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并非理想，在宦海浮沉中，李元阳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体，年仅44岁就失意地归隐故里，融入了另一个适合于他施展才能的天地之中。他在回首这不到20年的宦海生涯时曾深情地总结道：“自从外出做官以来，先是在翰林院，碌碌无为。在县令、郡守任上，差强人意，还能得到赞颂。待到出任御史，过于自信，以为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生死荣辱可以置之度外；殊不知如此卖力必然要得罪于权臣国戚。尤其在荆州时，因为不愿给太监小人跪拜，惹起祸端。侥幸的是尚能保全了这把身子骨，得以活着和久别的乡亲聚会。”（《答溪田翁尊师马老先生》）

回到家乡之后的李元阳，仍然没有抛弃曾经拥有过的社会责任感。他“薄自奉，厚施予，如婚嫁、丧葬、饥寒、冤抑，以至桥堤、道路，列为三十二事，日以自课，至老不替，虽废家产不恤也。”（《侍御中溪李元阳行状》）同时，编修《大理府志》和《云南通志》。在生活上，他的日子还很舒适，他曾写道：“先人遗田百亩，足以自贍；近营山谷一区，可樵可钓，足以自娱。”（《答溪田翁尊师马老先生》）在《独游》诗中有“先世存馀荫，百丘负郭田，衣食既有馀”句。尤其是他在官任上回乡营造下的默游园和以后在点苍山搭建的中溪草堂，为他退隐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然而，舒适的生活并不能解除他精神上的痛苦，燕雀之安适难以抚平他当年的鸿鹄抱负。生活中的二律背反，时时煎熬和折磨着他宁静的身躯。照他自己的话说：“屈指五十年，何殊石火灼。”（《闲咏》）闻一多先生在评论孟浩然的隐居生活时，曾经这样说：“我们似乎为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

活的丰富，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维系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唐诗杂论》）这种思想在李元阳的诗文中同样可以得到明确的印证。

在《亭坐有怀》中李元阳写道：“生平私愿足，惟有叹离群。”在《秋怀寄林退斋》中，他又说：“万里风烟常北望，倚天宫阙紫云居。”这种情绪在他年老多病的时候更为强烈：

马齿年三十，天寒露骨筋。虽多莖林会，未达驰驱勤。
不肯杨边卧，犹嘶冀北群。可怜千里志，目送暮山云。

二

一个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在痛苦的煎熬中求解脱，解脱的途径有千条万条。李元阳首先采用的是陶渊明式的自责，于是他的诗里就有了众多这样的诗句：“生苦缘多欲，吾今悟昨非。”（《归里》）“四十余年事，遽觉已觉非。”（《卜居》）“半生悲我逐浮名。”（《别罗复初》）不过，光是成天地陷入“忏悔”是难以自拔的，只会越陷越深。唯一办法是建树一种信仰的精神支柱，才能得到心灵的解放。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最好药方大概就是理学了。从此，李元阳把后半生的精力投入到“心性命之旨”的研究，著书立说，最终成为“吾滇理学钜儒”（李根源语）。

对于李元阳的理学思想，李根源的评述是：“先生之学以佛入，以儒出。复性为本，济世安民为用。”这是有道理的。李元阳也承认这一点，他在《重刻〈楞严会解〉序》说：“余始从事格致之学，久而不得其门。里居，暇日得《楞严》读之，始掩卷而叹曰：‘格致之学，其精蕴具于此矣！’”在《读〈楞严经〉有感》一诗中，他同样写道：“一生徒自费精神，堪笑从前认此身。”在《读〈华严约语〉》中他又写道：“我读卷未终，顿觉双眸耀。”从此，他“悟来知昨非，始羡中林缙”，“身退已十载，迥与尘网离。居处爱泉石，结交必僧缁”；“早起一杯粥，升楼观藏经”，“久雨食无肉，书楼启经帙”，潜心佛典。在《与林尚书退斋二书》中，他这样披露道：“我回乡已经二十五年，大半时间来往于山林泉石之中，与僧人谈性命，与道士谈养生。虽然不能马上超度极乐世界，但心情愉快，有得天独厚的感觉。老了就闭门诵读《华严》《圆觉》等经，感觉一股太和之气充满全身，不知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快乐的事。因此，我一天十二个时辰，除睡觉

外，无非就关心这件事了。”他得出的结论是：“良知与良能，日月悬中天。老释方外儒，孔孟区中禅。”（《读〈楞严经〉有感》）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系统深入地阐述李元阳的哲学思想，对一般人来说，这是专业性很强的理论。在这里只是想介绍几点有关的问题：其一，《中溪家传汇稿》中，有关哲学思想的篇幅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内容却很丰富。这些内容除一部分分散在记、序、书说中外，集中的有《天地世界图序》《性说》《心识说》《意识说》《情识说》等专门著作，对于一般读者不免深奥难懂。其二，民国初年，昆明人施汝钦在重刻《中溪家传汇稿》序中说：“先生之面学养之心性，体之践履，固渊源于陆子（九渊）而与朱子（熹）殊途同归者也。”陆九渊（1139—1193）是南宋哲学家，理学“心学派”的创始人，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认为只要悟得“本心”，不必读书，“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与朱熹“理是本”，“理气不能分离”的客观唯心主义相悖。明代，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学的传统。赵藩认为，李元阳的观点接近王阳明，可以称得上是王阳明的“私淑弟子”。其三，从表面看，理学排斥佛、道，实际上在暗中吸收佛教的一些教义为我所用，陆王心学也是如此。然而，自称是陆学派门下的李元阳却毫不隐讳地公开打出崇佛崇道的旗帜，提倡三教合一，“不计为孔、为释、为老”（《答龙溪王年兄》）。这不能不说是与他性格的耿直、鲜明有关系。

三

一般说来，儒家重人事，重现实，佛家重解脱，重出离。正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所说：“佛家否定人生，儒家正视人生，道家简化人生。”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入仕为儒，辞官为道，身死为佛。”然而，人是复杂的动物。人类学者卡莫迪说过：由于人有追求知和爱的本性，因此各种宗教在传统上都有一种自我超脱的理论，并力图引导人从自私走向人性，从偏狭走向爱。这便是他永恒不灭的人道主义。这一点在李元阳身上体现得很明显。

尽管李元阳称自己一天十二时辰痴情于华严精蕴，但从他的诗文看，出世的人道主义仍然是他生活的主流。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李元阳文章中（主要是在“序”和“书”中）有关吏治的内容当做“为没落的统治者献策”。试想，有不顾一切、敢于对皇上说“近年来陛下以爵禄畜小人”这样的献策者的吗？

李元阳确实直言不讳地提出一套节俭廉政勤政、反对贪赃枉法、严予治

吏的吏治主张，其中不乏“先民后君”、“以民为本”的真知灼见。我们如今读他的《〈南巡纪略〉序》《赠王通守序》《赠鹤庆何太守序》《贺浣石邢君序》《送太和令刘君迁守顺州序》以及《送赵参军》诗，然后联系当今的现状，不能不敬佩其诗文的鲜活性。读他哀民生多艰的诗《书轩言怀》《雨望》《苦雨叹》《农家苦雨不得刈麦》等，正直的人是会感动的。为了反对不义的战争，他一方面“为切己之痛不得不呼天呼父母”，冒险向当政者说，借土司之乱发动征讨，是喜好利者“急一己之功名，而视民若草菅”！同时，他还写出许多反战的诗歌，如“金沙渺渺江水赤，江边白骨纷交加”、“寄言世上爷与娘，生得男儿莫求乳”（《凯旋诗赠诸将》），“岂知喜功人，背上生剜疮”（《闻武定事》）。无怪乎李选在《侍御中溪李元阳行状》中评价：“先生作诗文初不经意，援笔辄就，世以白香山、苏东坡拟之。”

毋庸置疑，能够集中反映李元阳文学成就的是他的山水诗和游记。他不仅写出像《游清碧溪三潭记》《游花甸记》《游石宝山记》《游石门山记》这样脍炙人口的游记，以及反映大理风物山水的诗歌，而且有很精到的山水美学观。比如他说：“山水之系人文尚矣！然惟得山水之状者能述，得山水之情者能作。登临感触，啸咏赋形，至誉拳石为岱、华，侈勺水为沧、溟。观者非惟不知过而且从，而更武步之如恐弗及。故郎官名于太白，蓬池著于萧生。盖得山水之情于形状之外，悠悠乎将颢气与俱，而莫知所穷。此古人所为大游观而重自得也。若夫地以文显，景因人胜，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玉湖游录〉序》）主张“传神写照”，求神态之妙，即不求形似，但求神似。又比如，他说：“夫人之于山水，心烦者不知爱，神躁者不能爱，志消者不暇爱。烦则有所蔽，躁则有所逐，消则有所染。夫子曰：‘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山水之乐仁知之事。而蔽，而逐，而染，无怪乎有山水而不乐也。”（《〈苍洱图诗〉序》）提出了审美判断的主观性问题。还有“山水形状之变无穷，故章句之变亦无穷。”（《〈清华洞诗刻〉序》）“人由地佐，地以人重。自昔守山水郡者，惟词人为雄，蘋洲以柳，西湖以苏。

然惟有政，其文益传；有文，而后其地益显。”（《送元冈马大夫之任序》）等等的提法，都为他的山水文学的写作奠定了理性基础。

在李元阳的风情诗中有些细节也是值得注意的。比如在《鹤云寺仙姝潭》中引用了仙姝的传说，在《玉局怀古》中引用玉琵琶的故事，在《阳溪罗刹行》中写观音智闭罗刹的传说，在《七月下弦日寺坐》中描写洱海耍海会“竞花船”（目前说竞龙船是不准确的）的场面等，很富有地方民族

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写下的《翠屏草堂记》，称得上是一首人生的绝唱。这篇散文着力表达出作者垂暮之年旷逸悠然的活动和坦荡豁达的心态，充分地表现了他的人格魅力。

四

万历八年，即李元阳去世之年，云南监察御史刘维来到大理。刘维是湖北荆州人，李元阳在荆州时，他还是一个“四五岁戏竹马”的儿童。懂事以后，他就常听到人们传颂李元阳的德政和品格，心存敬佩。来大理后，了解到先生文集（由李元阳的儿子李傅、李煌辑录，其门生李东、何文极校正）所以久不传的原因：“中溪李先生自选馆入台，以及治郡、还山，凡有感而发，著为文辞，咸载是集。每部使者至滇，慕先生道德文章之盛，必肃谒请观其集，或即捐禀饬馈先生，俾梓以传。先生究心方外之学，以施与为事，尽散所馈，未遑刻集，故集久未传。亦其重德惠而轻文章，不以炫奇风美为高也。”于是，刘维就动员其他地方官员捐资刻印《中溪李先生集》（也称《中溪家传汇稿》）。历经三百多年，屡遭兵燹，刊版久毁，传本难觅。据说陈荣昌在大理周霞处获得钞本，由李根源编入《云南丛书》，刊行问世，更名《李中溪全集》。《全集》共十卷，诗四卷，收诗近九百首；文（包括序、记、传、说、书等）约两百篇。

诚然，我们还可以找出李元阳的许多时代局限，甚至于缺陷。然而，如今学术宽容已经成为共识。这正如钱宾四先生提出的，在评价历史时，既要尊重“时代意见”，又要重视“历史意见”。如果在评价历史时，不知“历史意见”，那是无知；若明知“历史意见”为何，而又以自己的“时代意见”来肆意吞没“历史意见”，那就是狂妄，是数典忘祖。这许说是我们广收博采不遗余力地编校《李元阳集》的宗旨。

目 录

导 言	(1)
-----------	-----

· 杂记类 ·

游盘山舞剑台记	(3)
游银山铁壁记	(6)
游鼓山记	(10)
登武夷大王峰记	(12)
游龙虎山记	(15)
游皖山记	(18)
浩然阁记	(20)
默游园记	(23)
山水卜筑记	(25)
榆城近郭可游山水记	(27)
游石门山记	(31)
游清碧溪三潭记	(34)
游石宝山记	(36)
石宝山记	(39)
游花甸记	(41)
天生桥石表记	(44)
游九顶山记	(46)
附录:九顶山记 九顶寺记	(47)
翠屏草堂记	(48)
游鸡足山记	(50)
附录:游鸡足山记	(56)

鸡足山迦叶院记	(58)
袈裟院记	(60)
附录:袈裟寺记	(61)
鸡足山放光寺记	(62)
建圣峰寺常住碑记	(64)
芝泉庵记	(65)
鸡足山庆丰寺记	(66)
宾苍阁记	(68)
重修竹林寺记	(70)
大观堂修造记	(71)
崇圣寺略记	(74)
附录:重修崇圣寺碑记	(76)
崇圣寺重器可宝者记	(77)
让公庵记	(79)
地藏院记	(80)
珠海寺记	(82)
广通县弥陀院记	(83)
徙建宗岳庙记	(85)
八腊庙记	(87)
附录:大理八腊庙碑	(88)
觉真庵记	(90)
瑞云观记	(91)
重修感通禅寺记	(93)
重修宝庆院记	(96)
仙羊山弥陀寺增修殿阁记	(97)
标楞寺田记	(98)
云南省城昆明县地藏寺记	(99)
马龙州中和山现瑞记	(100)
镇蝗医王寺记	(102)
嵩明何有庵记	(104)
黑盐井重建三元宫记	(105)
大理文昌宫记	(106)
北极寺记	(107)

赵州重建解宇记	(108)
大理府名宦祠记	(109)
姚安职盗公馆壁记	(111)
白崖土城记	(113)
大理改建府治记	(115)
洱海兵备道铁索箭军营厅壁记	(117)
铁索川平贼记	(119)
邹公塘记	(120)
建漾濞守备署记	(122)
鹤庆府题名记	(124)
分守道鹤庆公署记	(125)
府县报功祠记	(127)
赵州甘雨祠记	(129)
桂香院记	(131)
宾川平盗记	(133)
洱海兴造记	(135)
肃政使白岳王公息患记	(137)
姚安太守东洪杨公遮留记	(139)
南山寓意画卷记	(141)
寿国堂记	(143)
椿萱并茂堂记	(145)
《金玉交辉图》记	(147)
秀峰书院记	(149)
学田记	(151)
大理府学新作泮池记	(153)
剑川州重修儒学先师庙记	(155)
源泉书院记	(157)
明志书院记	(159)
金华书院记	(161)
重修大理府儒学置学田记	(163)
三教阁记	(165)
南薰桥记	(166)
永济桥碑记	(168)

楚雄青龙桥记	(169)
彩云桥记	(171)
点苍山志	(173)
西洱海志	(176)
白崖毕钵罗窟志	(179)
苍洱图说	(181)
太玄宫铭	(183)
黑水辨	(186)

· 序跋类 ·

《福建乡试录》后序	(191)
初刻杜氏《通典》序	(193)
《南巡纪略》序	(195)
《送升庵先生还螳川客寓诗》序	(197)
升庵《七十行戍稿》序	(199)
刻《檀弓丛训》序	(201)
《青华洞诗刻》序	(202)
重刻《楞严会解》序	(204)
重刻《法华要解》序	(207)
《金光明最胜王经》序	(209)
《永嘉宿觉禅师集》序	(213)
刻《八识矩规》序	(215)
《天地世界图》序	(216)
《苍洱图诗》序	(218)
《大理府志》序	(220)
《游名山记》序	(222)
《雪山庚子稿》序	(223)
《玉湖游录》序	(225)
《苍洱联清图》序	(227)
刻《篆法提纲》序	(229)
《云南通志》序	(232)
《陈希夷像赞》序	(235)
《会语》序	(237)

《公餘录》序	(239)
《看山楼乡耆燕集》序	(240)
《知新初稿》序	(242)
《何柏斋先生小令》序	(243)
《禺山癸卯诗》序	(244)
《平南集》序	(245)
《杜氏衍庆图》序	(247)
叙《烟霞俱》	(249)
《黄华老人诗石刻》跋	(251)

· 赠序类 ·

送元冈马大夫之任序	(255)
送赵学宪参蜀政序	(257)
送刘楚雄之平乐府贰守序	(259)
送宾川州守萧省庵序	(261)
赠鹤庆何太守序	(263)
赠王通守序	(265)
送东川张宪副序	(267)
送桂玉台序	(269)
送太守周公述职序	(270)
送提举愧庵李君之武定贰守序	(272)
台宪魏村杨公平武定诸夷序	(274)
送孙太守序	(276)
贺浣石邢君序	(278)
送邻郡太守万峰周公还潼川序	(280)
送广南太守平轩王公辞官归养序	(281)
送台宪侣梅陈公入贺序	(283)
送方伯左使狮冈陈公述职序	(284)
送岐山李君教授清平序	(286)
守备陈君善职序	(288)
赠州守南江胡侯奖劝序	(290)
送州守刘侯望海公之任序	(292)
送太守丹崖莫公序	(294)

送太守莫公人觀序	(296)
再送郡守莫公述职序	(297)
迎郡尊丹崖先生考满复任序	(299)
送肃政白岳王公迁江西参藩序	(301)
送太仆少卿洛浦田公序	(303)
赠太和令刘君迁守顺州序	(305)
重送顺州守云峨刘君序	(306)
送岷山杨太守考绩序	(307)
送舒通守序	(309)
送史太守述职序	(311)
送邓太守东归序	(313)
姚安太守卓吾先生李公善政序	(315)
送郡宪淡亭雷君归养序	(317)
送大理通守夷陵许君归养序	(318)
送高郡丞序	(320)
送环江俞君赴华阳王府教授序	(322)
送张德征序	(324)
送太和令蒋君乞休归里序	(326)
送思梅颜君序	(327)
鸡足山别王屋山人序	(329)
寿升庵先生六十序	(332)
王太夫人逾七望八寿序	(334)
寿霞山蔡翁八十序	(336)
天台高翁八十序	(338)
林太夫人寿序	(340)
台宪邹公父母双寿序	(342)

· 书说类 ·

答溪田翁尊师马老先生	(347)
与罗近溪宪伯	(349)
与林尚书退斋二书	(350)
答默泉吴尚书	(353)
与剑门赵察院	(354)